

# 数字治理：武陵山片区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新路径

## ——以湘西州“为村”建设为例

唐菁阳 钟小芬 夏梦媛<sup>1</sup>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湖南 常德 415100)

**【摘要】** 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现代人工智能以及现代供应链等为主要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治理领域的应用, 武陵山片区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有了一条崭新的途径。连片特困地区治理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探求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的运用和效果问题, 对于建立健全乡村治理制度, 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相关学术史的爬梳, 利用湘西州“为村”建设的实践经验, 揭示武陵山片区数字治理现状, 其中信息化设施薄弱、专项资金不够、数字人才缺乏、持续运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制约了乡村数字治理能力的提升。最后根据武陵山片区的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以期为该片区数字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提供借鉴。

**【关键词】** 数字治理 治理能力 乡村治理 湘西为村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每一次科学技术的变化, 人类社会的生产模式、管理手段和体制机构都将随之发生相对应的革新。以现代通讯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现代供应链等现代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各类技术在我国深入推进, 运用“数字”手段进行政府治理显得尤为重要。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善于运用互联网开展工作, 发挥科技在社会治理中的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更进一步强调了信息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 用“技术变革”推动“服务变革”和“治理变革”。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来看, 近年来陆续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等政策文件, 将提升乡村数字治理能力提上重要议程。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 也就成为了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突破口。然而, 当前的实践显示, 数字技术的运用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村进行的较为顺利, 出现了北京南口智慧乡村、上海宝山“社区通”、广东阳江“智慧乡村+村务管理”、浙江德清“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等典型治理模式。但在集民族区域、革命老区、生态敏感度高为一体的综合性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片区推行起来却十分艰难。同样是推进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运用, 其效果为何会出现地区差异? 武陵山片区又该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提升该地区的乡村治理能力? 这是本文力图解决的一个研究问题。

国内外学界对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的运用上, 存在不同观点。在积极层面上, 王浦劬、杨凤春(2005), 孟庆国、关欣(2015)均指出数字技术在推进政府开放透明、增强回应、创新社会治理、提高政府效能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冯献、李瑾、崔凯(2020)认为当前的乡村数字治理能够很好的结合上级决策与各方面资源, 搭建出有效的乡村服务供给平台, 同时村民通过数字治理平台, 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消极层面上, 胡卫卫, 辛境怡, 于水(2019)认为信息技术增大了话语市场失灵、造成政治意识形态混乱, 出现数字鸿沟扩大、网络舆论差序等等问题。张晶(2020)认为数字技术的发展让不良信息与虚假信息迅速传播,

**作者简介:** 唐菁阳(1986-), 男, 土家族, 湖南张家界市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社区治理; 钟小芬(1997-), 女, 土家族, 湖南湘西州人, 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夏梦媛(1998-), 女, 湖南邵阳市人, 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湖南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研究”(20B423)

---

有的村民不能够辨别，以致于影响村民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同时认为乡村数字治理有着先天不足，各种矛盾相互交杂，利益诉求不断涌现等问题。这说明了数字技术运用的利与弊，至于如何发挥数字技术应用之长，规避数字技术之短，宋迎法、尹红(2010)指出，数字治理需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因素去把握。王谦、曾瑞雪(2020)认为必须从系统化的角度来降低数字风险，在管理体系、管理过程、治理主体上着力完善。

综合来看，当前学术界已经认同数字技术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但更多的学者表达了乡村驾驭数字技术上的担忧，目前还没有提出一个行之有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运用数字技术的方案，更没有针对具有地区特殊性的农村提出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能力的问题。所以，本文将基于数字技术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效果上的地区差异，结合武陵山片区具体实践案例，探求提升特殊地区治理能力的数字路径。

## 1 武陵山片区治理能力提升的数字引入

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自实施精准脱贫以来，武陵山片区为代表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治理是脱贫攻坚阶段最难啃的硬骨头，直接影响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武陵山片区农村治理有自身特点。一是在治理的土壤和地理环境上，农村大部分都是处于一个分散、偏远、闭塞的丘陵和低洼地区，交通不畅，信息失真；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但综合利用率较低；农村耕地数量少，水土流失严重。二是产业单一。该地区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多以农业种植业为主，但其产量不高；其他产业基础薄弱，资源转化能力较差；生产力水平较低，商品经济落后。三是社会呈现封闭性。农村人口较少，分散居住，村民整体素质不高，思想观念落后。这些特点对于连片特困地区的乡村治理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对贫困现象历史性消除，推进后扶贫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阶段的重要任务。但与国家战略、任务部署不相适应的是，武陵山片区治理还存在着教育发展滞后、体制机制梗阻、产业振兴基础薄弱、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灾害风险防治体系缺乏、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供给不足等问题。这也是连片特困地区治理能力薄弱的突出体现。而制约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在于缺乏有效的治理手段与治理工具。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现代数字时代的快速到来，以现代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现代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在当前我国农村新一代信息数字化和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已经成为直接促进我国提高乡村治理综合能力、建立有效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现代化和推进乡村治理制度流程精细化的主要技术手段，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地方政府广泛关注，为其加快实现有效完成治理乡村目标任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驱动力。当前，如何将乡村的数据变成价值，如何利用数据实现乡村资源和村民的精准匹配，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新命题。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全球格局重塑，使得全球政府都面临着长期高度不确定性，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冲突矛盾呈现复杂多面的格局。一个持续创新、具有敏捷感知能力，并拥有全局之力的数字政府体系，将成为国家竞争力和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放管服”和治理现代化。社会侧、产业侧的系统水平，特别是互联网水平较为发达，而乡镇基层政府系统则相对滞后，这种不平衡造成治理能力不足，倒逼数字乡村的建设，倒逼“放管服”的深化。我国乡村数字治理，是由数字经济民生发展机制、乡村信息化设施、技术规范以及政务云平台这三大治理结构所构成的治理新体系。在武陵山片区，数字治理理念正在逐渐掌握，数字基础设施正在不断完善，数字技术运用正在逐渐熟练，数字人才队伍也不在不断充实。这为其乡村治理的数字引入提供了基础平台。具体来说，武陵山片区治理能力与数字技术的关系可以表现为：

首先，武陵山片区治理主体多元化离不开数字支持。长期以来，武陵山片区治理主要靠基层政府、村支两委等行政组织推动，村民无法也没有能力参与到乡村治理之中。随着新媒体等技术的高度发展，乡村社会权力、利益、资源等发生变革，个体或组织都可通过新媒体赋权获取信息资源、表达利益，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的民主自治发展中，传统的合法性在多元主体的权力组合中被悄然重构，村民、村委会、基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媒体等在乡村治理中将拥有各自的立场，各自的职责，会产生“1+1>2”的协同效应，这将大大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其次，各项村务的顺利开展与村务管理民主化离不开数字支持。基于信息体系的服务平台，连片特困地区的村民可以获取更多的村务资料、参与乡村整合治理更加方便，保障了村民的合法知情权。基层政府充分运用了信息化手段，开展了党建、管理村级事务、公开村级生活等，大事小事都是在村级的信息服务平台里进行讨论，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密切了村民与干部之间的关系，缓解了村民的矛盾，和谐了整个村庄的气氛。如有的村引进“财务管理软件账务处理系统”实现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村务公开网”，让村民只要登录网站就可以便捷、清楚地了解本村基本情况、发展规划与重要公共事务等。

最后，乡村公共服务离不开数字支持。武陵山片区由于地理区位、经济社会发育水平、基础设施配置等诸多因素影响，其在服务对象的信息采集、服务和监督等各个方面都将遇到更多的障碍，导致其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时效性、便捷度及丰富程度比较低。而数字技术可以为建立城乡一体化的、高效的、便捷的农村服务提供技术支持。如“卫生室卫生门诊收费系统”，简化了报销手续，村民可以以较低的获取成本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服务。“公共安全监控系统”通过在农村主要路口加装警用在线视频监控探头，实现 24 小时的在线监控。“环境在线监控系统”可以及时发现农村河道污染情况，便于进行高效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 2 湘西州“为村”建设的实践

### 2.1 湘西州乡村治理基本情况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湘鄂黔渝四省市交界处。截止 2019 年，全州总面积 1.55 万平方公里，共有 1566 个村，乡村人口 137 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 46.77%。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80.84%。湘西州是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核心区域，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首倡地。湘西自然环境条件较差、产业结构单一，农业产业化程度低，教育基础薄弱，农民在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生活能源等条件低于湖南省平均水平。湘西州乡村治理面临如下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信息化基础薄弱。农村互联网、通讯等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配置不足；农业信息跟不上当地农业发展技术要求和市场化需求；农民受限于地理区位、人口流动等因素，获取优质信息的能力较差，难以了解上级文件精神、村务等信息，信息参与的权利与发展机会较少。第二，乡村公共服务难度大。一是经过多轮“合乡并村”后，一个行政村的人口由原来的 700-1000 人普遍增加到了 1000 多人，基层治理的工作任务大幅增加。二是该地区农村较多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引发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婚姻挤压”、“空心村”等情况。第三，村民公共参与的渠道不健全，自身受教育程度低，导致村民对村务的参与度较低，缺少对公共生活、公共利益的热情和关注。

### 2.2 “为村”平台在湘西州的运营实践及成效

为响应国家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发展战略，湘西州积极探索新型乡村治理的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路径，在湖南省《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十三五”实施规划》湘发改西开〔2017〕974 号、《湖南省数字乡村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 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指导下，2015 年，湘西州通过利用腾讯“为村”这一移动互联网终端，开展“互联网+贫困村”建设。平台主要是帮助贫困村建立属于本村的微信公众号、村微信群，以连接信息、联络感情、脱贫致富为出发点，打通乡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打造智慧农村生态平台。从实际效果来看，湘西州“为村”推动了村务的公正、公开，使得村务决策更加民主、科学；在公共服务供给上，与社会扶贫广泛对接，扶贫更加公正、更加精准和规范，关爱留守老人和儿童更加得力，从事公益便捷、真实、更容易、更具公信力；“为村”还助力村庄重新拾起乡土文化，增进了村民之间的交流与感情；提升了村民的发展能力，在微博、微信、QQ、短视频等移动 APP 上运用自如，获取了大量新知识、新观念，农村网民也利用互联网向全国输出自己的特色，塑造着自己的乡村风貌。湘西农村产业加快升级改造，通过互联网与市场融为一体，不再盲目生产，农副产业收益有了实实在在的保障。2019 年底湘西永顺县科皮村、泸溪县马王溪村、花垣县十八洞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湘西州“为村”建设，受到了国家扶贫办网站及《中国扶贫》专题报道，州委常委等领导还受邀到北京参加“腾讯为村论坛暨农民收集上网培训会”，介绍湘西“为村”的具体做法与成功经验。

6年来，湘西“为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成立了专门的“为村”工作领导小组，由湘西州扶贫办主任任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各县扶贫开发办主任为成员，调研科负责具体落实。县(市)扶贫开发办相应成立领导和工作机构，明确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乡(镇)政府明确专人工作；村庄确定一位“为村”领头人，自行建立并逐步扩大“为村”工作团队；二是，资源投入上。资金方面，县(市)为申请到为村公众号的村庄安排扶贫专项资金，统一标准为每村6万元。人力方面。州、县(市)从“湘西州为村”试点村中选聘一名优秀公众号管理员，担任互联网村庄建设培训技术指导员，同时每年为其安排扶贫培训资金3万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关职能部门加快网络基础建设，逐渐实现WLAN覆盖村庄；在村庄设立快递代办点，建设村庄现代网络物流体系。三是，管理机制建设上。建立了宣传激励机制，使推广工作先进工作者得以表彰；建立了汇报机制，使领导小组及时获得“为村”进展；建立了分享机制，使先进经验得以扩散；建立了培训交流机制，利用人力资源推动了“为村”纵向推进；建立了督查督办机制，利用绩效考核确保日常工作目标的实现。

### 3 湘西州“为村”推进治理能力的不足及原因分析

由于以“为村”为代表的乡村信息化的推进，数字技术日益进入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推动了乡土社会秩序的变迁与重建，改变着乡村的治理生态。乡村治理能力必须回应这些挑战。在“为村”的实践层面上，还有一些因素制约了数字技术的赋能。

#### 3.1 建设资金缺少保障，信息化基础设施不完善

要想以“为村”建设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就离不开较大的资金投入。然而，目前“为村”建设及运营的资金来源较少，且渠道单一。湘西州虽然加大了资金投入，但还不足以维持“为村”的运营，腾讯各项激励资金虽作为辅助，但很少能申请下来。湘西州作为精准扶贫的重点对象，目前的资金很难维持“为村”建设所需，诸如公众号开发、网络安装、电脑和打印机等办公用品、农产品包装设计等的消耗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自从国家的扶贫工程项目经费在县一级的层面进行了整合以后，州扶贫办就很难适时地为各个村落安排发放启动经费。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财政乏力，但更重要的是此项目的性质。“为村”建设具有一定程度的沉没成本，收益期较长且不明显，所以其他社会主体不愿意投入到数字乡村的建设中来，仅靠政府划拨、村集体自筹无法负担。资金的不足进而导致信息化基础建设不足。

#### 3.2 数字人才不足，信息技术运用效果不佳

湘西州“为村”技术人员不足表现在本村的人才队伍建设落后和平台管理员团队缺乏专业性。村内留下的人员一般多为老人及小孩，大部分青年都在外地工作，大学生也都因地域及个人主观因素离开湘西州，导致村内能进行稳定工作的青壮年很少。专职管理“为村”的干部稀少。“湘西为村”平台管理团队缺乏专业性，受村内文化水平影响，管理员缺乏“为村”、互联网、网络的相关意识、知识及技术，也很难把村庄的独特优势和特色资源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另外，腾讯作为技术指导者，它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只停留在培训班授课层面，这使得本村技术人员处于理论设想问题并按部就班解决的状态；驻村技术人员并未与村技术人员进行长期实践与问题解决，在实际处理“为村”运营问题时，没能给到一个恰到好处的措施。

#### 3.3 运营机制不健全，后续动力不足

目前，从湘西州“为村”微信公众号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平台建设出现了一种各服务板块没有共同推进的现象，公众号上，仅有党建之家模块一直持续更新内容，如党员教育，基层党员的一天；政务大厅，其最近更新时间为2018年，其作用仅停留在利用“为村”平台发布相关通知，并没有政务办理通道，说明“为村”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做到物尽其用，服务模块的使用仅停留在建立之初，而后大多数模块成为空壳，并无实质内容。“为村”的电商服务因缺乏专业运营团队、用户黏度低、产品包装缺乏吸引力等问题而发展缓慢。湘西州委州政府只是在引入初期出台相关推广及试点方案，在大多数“为村”平台建立之后，并无后续推进指导意见。致使“为村”持续运营乏力。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的性质具有一定的营利性，所以企业在湘西州“为

村”平台只是止足于前期建设，并没有深入到后期维护。

## 4 推进贫武陵山片区乡村数字治理能力的路径选择

随着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愈发重视，多项顶层设计式的政策文件出台，湖南武陵山片区广大农村应该抓住战略机遇期，针对现实存在的“三农”问题，用好用活数字技术，提升治理能力，推进乡村振兴。结合湘西实践经验，本文认为提升武陵山片区乡村数字治理能力，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 4.1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在中国乡村传统治理开启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配套的技术人才培养是根本。没有规模化的人才培养的支撑，实现数字治理就变成“形式主义”，无法落地。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能力，不是让数字替代乡村人工治理，而是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中，通过对乡村治理人员进行技术赋能，增加村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中可以触达的深度、广度和精度。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就要培养善于运用互联网思维、数据治理思维的工作队伍，形成自身可以依靠的管理、运营的承管团队，确保对信息的管理权及对工作常抓不懈。作为连片集中特困地区的武陵山片区，一是要解决数字人才引进的问题，二是要解决数字人才流失的问题。对此，可以采用“引进-召回-培训”制度，即先引进相关技术人才，然后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召回一批有理想、有干劲的年轻人，通过引进的人才培训召回的年轻人，让乡村自己拥有技术。如此，不用担心引进人才的扎根问题，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劳动力回流。同时，也要积极地发动村委领导班子、村官、驻村领导班子、返乡少年青年等带头申请“为村”管理员，同时也要挑选一些具备一定数字化知识，有过多种网络运营体验，会用数字媒体的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其重点教育和培养对象，发挥他们的示范作用。

### 4.2 完善数字乡村基础设施架构

数字乡村建设所需的基础设施架构包括云平台架构、信息化公共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乡村物联网感知基础设施等。统一的乡村政务云平台是推动乡村地区实现信息化和数字治理的重要核心支持，它为农村地区的政府提供了集约、安全、稳定的电子政务平台，具有计算、存储、大数据、视觉智能计算、物联网、安全保障等综合性功能。基于云计算平台，乡村治理可以实现决策的数据化、公共服务的智能化、多元协同的网络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可以触达每一个环节和角落；基础信息网络主要包括互联网、公众服务业务网、非涉密政府办公网和涉密政府办公网等部分。信息网络已经涵盖乡村里的各项村务，如老百姓生活所需的水电、交通、家居、生产、贸易等各种应用领域。所以，政府应在网络安全、基础通信管线全覆盖、移动通信基站设立、无线网络、光纤宽带等方面给与一定的扶持措施，降低农村信息使用成本；农村物联网是以无线传感技术、物理资源虚拟化技术、信息处理技术为核心，实现人与物或物与物的链接，对要素和流程进行识别和管理。建设农村物联网可以为云平台提供信息素材，云应用通过处理这些素材后可以实现对物理世界的实时监控和精准管理。村民可以通过智能操控、远程医疗、电子抄表、智能农业等应用模块获得公共服务。

### 4.3 健全管理运营机制

数字治理将是未来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要避免走“重建设、轻运营”的老路，需要加快建立健全有效推动我国数字化乡村治理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创新运营长效机制，要以党建为政策引领，政府部门人员为工作主体，多方积极协作，科学决策，制订相关规章制度程序，规范工作流程，实施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一是进一步增强对乡村党组织工作的引领核心功能。党组织是领导乡村社会治理的一个根本保证和基础性前提，也是推进乡村数字化治理工作的设计人、领导者，要把如何加强各级党组织队伍建设、提高领导能力工作作为推进乡村治理工作的重点和主线，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整合资源、协调利益、促进农民群众健康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二是乡镇基层政府要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大力推动政府购买服务、PPP、项目专项经费支持等形式，促进互联网企业、社会团体与网络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在信息收集、政务云平台建设、技术支

---

持、维护升级等方面协同合作,实现“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多元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三是,综合借鉴其他互联网+平台,打造以党建为引领,以移动互联网应用为载体的大众化村民互动交流平台,鼓励村民在平台上对村庄事务发表意见与公开投票,让更多村民参与数字乡村自治以提升村民的参与度和认同感。

## 5 结语

乡村治理正从“总体支配”迈向“技术治理”。在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武陵山乡村振兴相结合的转接历史性机遇期,武陵山片区必须要紧紧抓住以 AI 技术,物联网、云计算和 IT 技术等为主要代表的新一代全球化数字技术,以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能力,使之与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有效地结合。武陵山片区作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具有民族政治环境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各类自然灾害多次频发、经济社会和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等特点,其治理能力如何,将直接地影响着武陵山乡村治理的能力及其治理制度体系的健全和现代化建设。本文由地区特点展开,以湘西“为村”建设为观察点,系统考察了该地区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提升治理能力的问题,探寻影响武陵山片区乡村数字治理的制约因素,当前必须在专项资金投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人才培养、运营机制方面着力改善,以期构筑决策科学化、治理精准化和服务高效化的乡村治理能力奠定数字化基础。

### 参考文献:

- [1]王浦劬,杨凤春.电子治理:电子政务发展的新趋向[J].中国行政管理,2005(01).
- [2]孟庆国,关欣.论电子治理的内涵、价值与绩效实现[J].行政论坛,2015(04).
- [3]冯献,李瑾,崔凯.乡村治理数字化:现状、需求与对策研究[J].电子政务,2020(06).
- [4]胡卫卫,辛璟怡,于水.技术赋权下的乡村公共能量场:情景、风险与建构[J].电子政务,2019(10).
- [5]张晶.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的症结及解决对策[J].农业经济,2020(08).
- [6]宋迎法,尹红.电子治理风险分析:基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的视角[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
- [7]王谦,曾瑞雪.社会技术系统框架下“数字政府”风险分析及治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05).
- [8]韩俊.谱写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N].人民日报,2018-11-05(007).
- [9]刘俊祥,曾森.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智理属性,顶层设计与探索实践[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1).
- [10]侯志阳.数字乡村有助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5-14(007).
- [11]张成林.信息化与农村治理现代化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
- [12]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统计局.湘西统计年鉴[M].湘西自治州统计局,1991.
- [13]孙沁.“湘西州为村”——“互联网+贫困村”网络扶贫新模式的探索[J].时代农机,2017(04).
- [14]张建锋.数字政府 2.0 数据智能助力治理现代化[M].中信出版集团,2019.

---

[15]房正宏,王冲.互联网时代的乡村治理:变迁与挑战[J].电子政务,2017(01).

[16]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J].中国社会科学,2009(06).